

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摘要

一個機構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本身內部的規劃和運作，同時也和他身處的社會環境有關。在發展歷程中，機構內一些人物的能動性或可發揮關鍵作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可以作為個案，來展現機構歷程和社會變遷的關係。本文首先回顧該學院歷史的六個階段，並勾劃不同時期香港發生的一些重要大事，看學院歷程與社會背景之間有何聯繫。文章又研究學院早年師資的背景，以瞭解創系時的路向，特別是個別教師的工作和貢獻。學院的教育理念、課程特色、學術取向、研究重點也是本文的審視範圍。之後總結學院的一些發展經驗，尤其是教學人員的本地化和「系友化」兩個因素。最後將探討學院在新科技環境下課程要走的路向，及處於香港新政治氣候中如何面向未來的挑戰。

關鍵詞：機構歷程、社會變遷、個人能動、本地化、系友化

*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

壹、前言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事物，要考慮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甚至不同時間，而且要明白向量兩端之間的互相關聯。這種取向可用於觀察不同事物，分析一個學術機構也如是。本文著眼的個案，是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簡稱新傳學院）。我們希望察看它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發展，省思其歷程與經驗。

具體而言，本文有兩個目的。首先是審視中大新傳學院的歷史，及它和身處社會環境的關係。我們希望瞭解在社會、大學、學系、個人等層面的一些重要歷史時刻及其影響意義。第二個目的是勾劃學院的特色，及總結一些有用的經驗。中大新傳學院在華人傳播學界中是個鮮活的例子，究竟它的一些經驗是獨特的還是可以轉移的呢？

本研究的框架是希望兼顧宏觀與微觀的視角，瞭解大環境與機構之間的關係。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2015，頁 21）在所編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中曾這樣寫：

如果「新傳」是一個小火車卡，它走過的路軌有 50 年這麼長。1965–2015 年也是「香港號」這列火車的重要歲月，火車卡和整列火車唇齒相依，互為影響。學院經歷不同時期的變遷和發展，在不同年代發生的事件，某程度反映了香港的大環境。」

朱立認為，我們要向社會學取經，新聞傳播教育「總是和在地社會的政治經濟與傳媒業同步，兩者彼此依賴、互動」（王彥，2017，頁 89）。

用社會學中的結構（structure）與能動（agency）關係來說，一個機構的運作和當中個人的作用是互動的，影響到機構的表現（Dutta, 2011; Sztompka, 1994）。結構是指不斷出現的組織安排，足以影響個人的機會和選擇。能動是指個人能否作出自由的選擇。結構和科層組織是社會必要的組成元素，令社會可以有序地運作。個人可以在結構中扮演積極角色，而非完全受環境所制約，他有時甚至改變身處中的社會結構。在分析中大新傳學院時，這一對概念能夠提供一個有用視角。

本文有不同的資料來源，首先是中大在 1960 年代創立時，十多年間出版了三本《校長報告書》（香港中文大學，1969，1975，1979）。新亞書院的歷史也有專門刊物詳細記載，當中包括新聞系初創時的材料。第二個資料來源是學院在

40週年和50週年時分別出版的兩本特刊（李玉蓮、姚霞主編，2005；蘇鑰機等人，2015），內有很多老師的回憶文章和各種珍貴資料。第三個來源是其他相關的書籍和文獻。本文作者在學院讀書和工作前後有40年，當中自然有一些經歷和觀察。

貳、早期的中大新聞教育

根據李家園（1989，頁182-195）的考證，香港最早的新聞教育機構於1927年由香港新聞學社舉辦，聘得一些資深報人任教，於1931年便結束了。1936年有新聞業者創辦了生活新聞學院，設有夜間課程，也只維持了很短時間。1939年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成立了中國新聞學院，於1949年結束。到了1951年，香港教育司開辦高級漢文夜學院，設有新聞科目，但只辦到1956年。同年聯合書院正式成立，位於港島堅道的分部設有新聞學系，由廣東一些資深報人擔任老師。不過聯合書院在1963年加入新開辦的中大時，原有的新聞學系被取消。

香港在二次大戰後的人口不到200萬，因有大量內地移民湧入，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統計，1961年人口已達310萬。香港專上教育的步伐跟不上人口的增長。當時只有一所香港大學，在1961年學生總人數約2,000人。當時香港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口比例只有約2%。同年有4,600人參加英文中學會考，另有2,300人參加中文中學會考，大學教育的需求很大（香港中文大學，1969，頁5）。香港政府於1959年開始考慮，要成立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新大學，並於1963年正式成立中大。它由三所已在運作的書院組成，分別是有基督教思想的崇基學院、儒學背景的新亞書院，及服務本地社會的聯合書院。

中大創立時，除了得到政府的財政資助，它同時加入了英聯邦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與英國大學設立學術交換計畫，法國、西德、日本、意大利政府又協助開設各科外文課程，並且得到英國及美國的一些基金會支持，發展研究中心和各項計畫（香港中文大學，1975）。此時新亞書院也獲得美國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財政上的支援，並在教育方面有長期交流。

新聞學系在1965年成立時，已確立4項教學目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5，頁96-97；魏大公，1967）：一、以各種理論與實際課程，訓練學生在香港及東南亞地區從事記者、編輯及新聞事業管理之工作；二、使學生瞭解自由社會之真義，新聞自由之可貴及新聞從業人員對社會之責任；三、藉各種理論之訓

練，使學生畢業之後，能在國外或中大大眾傳播中心繼續深造；四、與香港新聞界密切合作，共同提高香港新聞事業之水準。新聞系創立之初，只設三、四年級，招收由其他學系完成首兩年課程的學生。課程內容兼顧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新聞專門課程。

中大剛成立時，於 1964 年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新聞學院的喻德基教授，來港協助設立新聞學系。他建議新聞系不設一、二年級，學系不應偏重新聞技巧訓練，新聞系應適當輔助大眾傳播事業提高其水準，並推動研究工作。換言之，應要達成教學、研究和為社會及新聞界服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9）。

學系的成立，有賴香港中文報業的大力支持，從學系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可見。主席是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 N. J. V. Watt，委員包括《虎報》社長胡督東、《工商日報》經理何鴻毅、星系報業公司總經理胡仙、《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還有亞洲協會代表袁倫仁、香港廣播電臺臺長 Donald Brooks 及《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港專員 Charles Mohn。當年由星系報業、《華僑日報》、《南華早報》共捐贈 12 個獎學金給新聞系學生。新聞界也協助代印學生的《實習新聞》刊物，並提供暑期實習機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9，頁 81-83；蘇鑰機，2015）。在 1965 年，《華僑日報》的岑維休出任新亞校董；星系報業的胡仙也於 1967 年出任新亞校董，並在 1975 年獲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學，與三年制具英國殖民地色彩的香港大學不同。由中大設立新聞系，一方面能配合香港中文新聞業的人才需求，也移植了美國新聞教育的傳統。因為英國的大學很少開辦新聞系，所以不宜將香港的新聞系設於以英文授課的香港大學。創立新聞系時，找了一些美國的教授前來設計課程和講學，並由亞洲協會資助建立群眾播導中心。

參、學院發展的六個時期

中大新傳學院至今 55 年的歷史，大概分為六個階段（蘇鑰機，2015 年 10 月 31 日），詳情可見表 1。首先是 1960 年代的始創期，由喻德基於 1964 年開始構思學系起計，年分由 1964–1973 年。由於新聞系是香港在正規大學首創，沒有很多前人經驗可參考，主要依靠留美學者喻德基提供意見。實行時由新亞書院的張丕介暫時充當系主任，加上聘請從美國畢業不久的魏大公，當時新亞同事戲稱「一個老爺一個兵」（黃建業，2015）。魏大公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1. 始創期（1964–1973）		
1964	美國亞洲協會資助下，新亞書院籌設新聞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喻德基來港協助	
1965	創辦中大新聞學系；成立群眾播導中心	
1966	出版《實習新聞》和《雜誌世界》	
1967		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六七暴動
1969		推行 10 年建屋計畫
1971		推行 9 年免費教育
1972		紅磡海底隧道通車
1973	遷入沙田新亞書院現址	開展新市鎮建設工程
2. 定型期（1974–1982）		
1974	改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增設廣播專業；成立傳播研究中心	廉政公署成立
1975	兩年制改為四年制；出版《傳播季刊》（ <i>Asian Messenger</i> ）	
1976	發生「沙田新聞事件」	
1977	宣偉伯來港擔任胡文虎講座教授，創辦傳播哲學碩士課程	
1978		實施 9 年免費教育
1979		地下鐵路通車；首批「居者有其屋」落成
1981	增設廣告及公關專業範疇	
1982		舉行首屆區議會選舉
3. 波動期（1983–1993）		
1983		港元波動，實施與美元聯繫匯率
1984	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新傳系系主任；1982–1986 年間先後有 5 位系主任	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第一波移民潮出現
1985	重申本科課程學術和專業並重	
1989		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第二波移民潮出現
1990		頒布《香港基本法》（簡稱《基本法》）
1991	聘請多位業界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大學改為三年制；新生人數由每年三十多人增至六十多人	立法局首次直接選舉
1992	本科課程專修範圍增加至 4 個：廣告、廣播、印刷新聞、傳播研究	
1993	開辦傳播哲學博士課程；英文實習刊物 <i>Varsity</i> 創刊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續）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4. 穩定期（1994–1998）		
1994	計畫引進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大亞灣核電站落成及向香港輸電
1995	《大學線月刊》取代《新沙田》	
1996	開辦修課式的傳播碩士課程	董建華當選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臨時立法會成立
1997	成立數碼攝影工作室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1998		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股匯，政府入市干預
5. 發展期（1999–2011）		
1999	改名為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辦新聞學碩士課程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居港權問題首次釋法
2000	開辦新媒體碩士課程；與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簽訂學生交換計畫	
2001	原有的傳播碩士課程，改為企業傳播碩士課程	
2003	設立中大新聞獎	沙士疫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爆發；50 萬港人遊行，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2004	開辦廣告碩士課程；成立傳播研究中心	
2005	開辦全球傳播碩士課程；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簽訂學生交換計畫	董建華辭職，曾蔭權接任特首
2006	《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成立新聞教育基金祕書處	
2007	與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簽訂學生交換計畫；擔任新聞教育基金祕書處	
2008	<i>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創刊	中國舉辦北京奧運，香港協辦馬術項目
2010	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增設「點子創作」作為校內實習小組	泛民主派發起 5 區總辭，引發「5 區公投」
2011	<i>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被納入 SSCI 數據庫	
6. 成熟期（2012–2020）		
2012	和商學院合辦五年制的雙學位課程；本科生恢復四年制課程；成立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C 研中心）	梁振英出任特首；反國民教育科爭議
2013	《傳播與社會學刊》成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收錄的期刊；與南韓翰林大學（Hallym University）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增設新聞與傳播學及社會學雙主修課程；推出新院徽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續）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2014	增設創意媒體實驗室作為第四個校內實習課程	全國人大對普選定下 8.31 框架，引致占領中環及雨傘運動
2015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傳播與社會學刊》成為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的第一本外文附屬學刊；學院慶祝成立 50 週年	特首選舉方案被立法會否決
2016		農曆新年旺角騷亂；立法會宣誓風波
2017	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合作，成立全球傳播四年制本科課程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西九龍站內設內地口岸區
2018	《傳播與社會學刊》被評為 TSSCI 一級核心期刊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港珠澳大橋通車
2019		反逃犯修例草案運動，過百萬人上街示威
2020	成立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實驗室	北京通過《香港國安法》，引發第三波移民潮；全球爆發新冠肺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of Missouri) 新聞系，來港前曾短期於臺灣的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當時還有一位美國來的訪問教授 Charles C. Clayton，他又是剛成立的群眾播導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學，1969）。Clayton 在密蘇里大學畢業，有數十年的新聞實務經驗。喻德基在 1968 年留下來做了一年訪問教授，系務於 1967 年轉交魏大公接手，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學院都享有盛名，決定了中大新聞系的發展方向。那時新亞書院要到 1973 年才遷入沙田的校園，新聞系師生之前曾在界限街孟氏圖書館等地上課（朱雯、黃郁文、李玉蓮，2015）。

第二階段是 1970 年代起，可稱為定型期，時間為 1974–1982 年。學系的規模稍增，易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增加了廣播課程，並由兩年制轉為四年制。當時的辦公地方分設在新亞書院及大學中部的碧秋樓，後來才集中搬到山頂的新亞書院。1976 年，學系發生《沙田新聞》事件，學系的實習刊物報導了一些中大畢業生未能考獲政府的政務官，大學高層對報道要問責，令系內一些教師受到譴責及後來不獲續約（馮德雄，2015a）。余也魯出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陸續增聘了朱立、皇甫河旺、李金銓等源於臺灣的生力軍。余也魯又邀得傳播學大師宣偉伯（Wilbur Schramm，又譯作施拉姆）來港，在 1977 年創立傳播哲學碩士課程，積極為日後儲備本土的教研人才（余也魯，2015a，2015b）。在這階段，學系和美國及臺灣的學術界有一定聯繫，當年曾到訪或短期任教的學者有 Ithiel de Sola

Pool、Alex Edelstein、Robert Bishop、Bradley Greenberg、Ken Starck、William Hachen、汪淇等。

1980年代的第三階段是波動期，由1983–1993年。此時香港前途未卜，中英談判剛剛開始，人心不穩，港元大跌，中大新傳學系的人事反覆。1982–1986年間，余也魯退休後，朱謙從夏威夷來了一個學期就提早離開了，系主任一職先後由鄭惠和與關信基暫代，到了朱立領導系務才穩定下來。此時有李少南、陳韜文、蘇鑰機三名校友先後從美國學成回歸，教師本地化悄然開始。學系在1980年代初增加了廣告和公關課程，但仍側重文字新聞訓練，新設立的《新沙田》替代了原來的《沙田新聞》。朱立推行課程改革，令學生選科更有彈性，又邀請外地教授來港短期任教，包括Erwin Atwood、Thomas Baldwin、羅文輝、王嵩音等（朱立，2015）。在此期間，由於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每年招生人數倍增，同時聘用了更多新聞傳播業界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六四事件嚴重影響了1990年代香港的發展，有一些老師移民離港，美國著名教授George A. Comstock被邀來當系主任，他先後聘請了幾位美國老師，包括James Kenny、Robert Stone、Bryce McIntyre、Lars Willnat、Karen Wilkins（黎淑怡，2015）。Comstock創辦了傳播哲學博士課程，但他逗留了兩年便返美國。

第四階段是由1994–1998年的穩定期，系主任一職開始由香港新生代接手。Comstock之後暫由梁偉賢接任，繼由陳韜文出掌系政。陳韜文從美國引入一些年輕剛畢業的留美大陸學者，如潘忠黨、魏然、陳懷林等，一些本地教師如李少南、蘇鑰機、馬傑偉、梁永熾、姚霞陸續回歸，又邀得李金銓再度來中大當講座教授。李金銓作為第二代主要的華人傳播學者，帶領著歸聚的第三代本地及大陸學者，努力探究各項學術議題。新傳學系此時士氣上升，開始凝聚力量。區報《新沙田》在1995年蛻變為《大學線月刊》（陳韜文、蘇鑰機，1996），加上在1993年創辦了英文的*Varsity*雜誌。1996年率先開辦了修課式的傳播碩士課程。

第五階段是發展期，由1999–2011年。新傳學系改名為新傳學院，預示了學院接下來的許多發展。唯一不變的是學系同仁繼續支持「學與術並重」的課程方針，它一方面強調理論和思考訓練，另一方面著重專業技術培訓，並且保持課程的彈性，以配合時代發展和業界需求。院長李少南銳意設立多個修課式碩士課程，在扎根香港之餘，並開始招收大陸學生，令學生和教師人數均增。同時大量聘請業界資深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加強和傳播行業的聯繫。此時學院又啟用電話調查民意中心，積極發展教研的廣度和深度。在大學對學院的常設撥款未有增加的情況下，仍能透過修課式碩士課程開拓新資源，擴充學院的規模與能量。

千禧年的後半段由蘇鑰機接力當院長，加強學生對外交換計畫，進一步發展與新聞界的關係，並設立了兩本學術期刊《傳播與社會學刊》和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教師隊伍以本地人為主，不少還是系友（例如馮應謙、邱林川、梁麗娟、朱順慈、李立峯），配合來自臺灣（例如羅文輝和黃懿慧）及海外的學者，形成一個既本土又多元化的團隊。

自 2012–2020 年是第六階段的成熟期，前一段由馮應謙出任院長，2017 年起由李立峯繼任，可說是由第四代華人傳播學者接棒。這段期間學院規模人手更上一層樓，獲大學增撥地方作教研及辦公用途。有很多本地的老師加入教研團隊（包括一些系友如譚蕙芸、潘達培、陳志敏、區家麟），同時也聘用不少大陸和外國學者，人數眾多及組成多元。課程方面新設「點子創作」（Pinpoint）和「創意媒體實驗室」（Creative Media Laboratory）兩個校內實習課程，成立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C 研中心），努力走向國際化，推出更多海外交換計畫和學習之旅，令學院在國際聲譽、收生質素及師生研究成果諸方面均名列前茅，兩本中英文學術期刊分別被收錄於 TSSCI 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學術數據庫中。在 2017 年學院和英國的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合作，成立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

肆、學院和社會的互動關係

表 1 列出香港自 1960 年代至今的一些重大社會事件，並且和新傳學院的大事並列，以作參照。香港在 1960 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調整治港方針，大力發展房屋、交通、教育、城市等建設，和不久前創辦中大是在一個共同社會脈絡。1950 及 1960 年代的香港仍然很落後，需要人力資金以作發展。中大的成立得到美國學術和文化界支持，首任校長李卓敏原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系，初時借調 3 年到中大出任校長，後來一直留了 15 年（香港中文大學，1979）。另一例子是在 1966 年，中大仍在籌建校園，邀得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從美國來香港，對校舍設計提供意見（香港中文大學，1969）。

中大以新亞書院創建新聞系，而非由原有新聞課程的聯合書院統籌，這是個小小的謎團。歷史文獻對此並無明確紀錄，可能和當時新亞書院的意願和它掌握不同界別的人脈有關（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5）。中大的目標是為香港培養不同行業的人才，例如首創新聞、藝術、音樂等學位課程。新聞學系得到報界大力支持，因為行業需要高質素人才，中大的課程將新聞訓練正規化，請來美國

著名新聞院校的教授幫忙。1965年中大率先在香港創立新聞系，之後浸會書院和珠海書院均於1968年建立新聞科系，樹仁書院於1971年也推出相同課程。

到了1970–1980年代初學系的定型期，此時香港社會經濟起飛，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改善，大型基建包括地下鐵路、居者有其屋、9年免費教育、廉政公署成立等，都標誌著香港的高速發展，這和新傳學系以及中大的發展同步。學系此時提供更多類型的課程，本科生人數倍增，並創立全港首個傳播哲學碩士課程。中大有頒授大學學位的優勢，在香港新聞教育中處於較佳位置。此時系內仍是臺灣教師作為主力，極少本地的全職教員。

1980年代初，香港政治前景開始不明朗，出現信心危機。中英談判並不順利，港元兌美元匯率一度暴跌，雖然後來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仍出現第一波移民潮。此時新聞系的人事不穩，1982–1986年間先後出現5位系主任，足見情況嚴重。幸得幾個年輕本地畢業生在外地學成後回校服務，局面得以維持。在此時期的後半段，發生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出現第二波移民潮，學系8名全職教師中有3人移民他去。後來Comstock當系主任時，僱請了數名外國學者以填補人員空缺。但外籍教師融入需時，加上有語言和文化差異，系內的能量和對外的聯繫未如理想。

在九七回歸前後，中英政府在政制和交接安排上仍有爭拗，於是有臨時立法會的設立，大亞灣核電廠此時啟用，回歸後出現短暫的亞洲金融風暴。政治主權易手，香港有人離開也有人從外地回流，整體政治局勢較為明朗。學系因有一些本地學人回歸，加上聘請了幾位源自大陸的年輕學者，人事上得以補充。系主任開始本地化，李金銓由美國回來停留數年，研究氣氛活潑，環球媒體如何報道香港回歸都成為研究題目。

千禧年後香港經濟仍有發展，政治上偶然爆發大型示威，整體政經環境有起有跌，但大家一般覺得香港政治情況比回歸前預期的為佳。高等教育的質與量都有提升，浸會學院於1994年升格為大學，千禧年前後香港大學和城市大學先後設立新聞傳播科系，之後恒生管理學院升格為恒生大學，也成立了傳播學院，這些努力加強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廣度和深度。中大新傳學院在這段時期起飛，增加了人手，院內團結穩定，團隊以本地人為主，也有來自大陸、臺灣和外國的教師。學院得到大學支持，順利推出新課程和計畫。特別是陸續推出的五個修課式碩士課程和全球傳播學士課程，它們不單加闊了傳播學科的範圍，增加了學院的財政收入，又回應了近年傳播業界對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等領域的人才培訓需求。它能夠在教研方面發揮香港的中介角色，成為中西溝通的匯聚點，在

亞洲區內發揮顯著作用。

最近十年，香港發生數次重大爭議事件，政治環境逐漸下滑，令人擔憂社會穩定。同時大陸和香港迅速融合，文化上出現身分認同等爭拗，內地對香港的影響愈見明顯。此時中大新傳學院進一步擴充，推出新計畫又獲得一些學術榮譽。它一方面努力對外聯繫，同時也 and 中國內地有互動交流，招收頗多內地學生。學院在 1990 年代初已開始和海峽兩岸的學者交流，較有規模的是傳播學訪問學者計畫，自 2008 年起舉辦，每年邀請幾位大陸學者到學院作短期訪問（陳韜文、程曉萱，2017）。此外，學院 C 研中心的工作小組每年擬定主題，提前公開徵稿，邀請大約十位大陸、臺灣和海外的學者參加每年一度的工作坊，大家提交論文和作深度研討。部分論文經匿名評審後，發表於《傳播與社會學刊》，並曾出版專書。

曾參加過工作坊深圳大學的周裕瓊表示：「香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好比一個海納百川的學術海港，而一年一度的工作坊則引來千帆競秀」（陳韜文、程曉萱，2017，頁 71）。武漢大學的尚珺說：「工作坊非常好地以研究問題為導向，聚合兩岸三地和國際學者，讓大家充分地、自由地進行討論，這種思想風暴所帶來的衝擊勢必對研究者產生重要的引領作用」（同上引，頁 91）。臺灣中正大學的管中祥說：「來自各地的華人傳播學者在此分享研究與實踐，溝通、批判、論辯，不但能走出研究的同溫層、舒適圈，更重要的是，彼此砥礪、擴大視野，反思自我的局限，為華人傳播研究留下重要的累積」（同上引，頁 92）。在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大背景下，學院作為東西方橋樑及扮演兩岸學術交流的中介角色頗為重要。除了接待大陸和臺灣的學者到訪，一些中大的教師前往兩地講學交流。例如陳韜文是首位傳播學的長江學者，經常在復旦大學與師生互動，馮應謙也曾獲選擔任珠江學者。近十多年來，中大和清華大學及政治大學都有簽訂短期學者互訪協議。

新傳學院有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的傳統。早於 1980 及 1990 年代，學院的老師在《信報》開闢「傳媒筆剖」專欄，每週輪流撰文。由 2014 年至今，又在《明報》觀點版設立「媒體解碼」欄目，由同事每週撰寫媒體評論。學院在 2003 年設立中大新聞獎，每兩年一次評選優秀的香港新聞報道作品。自 2006 年起，學院和新聞教育基金合作，舉辦活動一起努力促進業界的水平。學院不時發放媒體調查結果，例如在 2014–2020 年間，進行連串有關「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的調查。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之後，學院接受監警會委託，進行了大型的民意調查研究，並提交和公開了詳細報告。

伍、師資背景和系主任情況

要深入瞭解一個學術機構的特點，就要觀察它的師資和學生，尤其是主要負責人的背景、學術訓練和工作成果，因為這些都會影響該機構的發展路向。在中大新傳學院逾半世紀的歷程，有眾多學者和老師，其中曾任系主任、院長等人物，都值得分析（蘇鑰機，2020）。

首任系主任張丕介屬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是經濟學者，他在新聞系創立的頭兩年兼任系主任。之後接棒的魏大公在新聞系服務了 22 年，其中 6 年擔任系主任（馮德雄，2015b）。喻德基和 Clayton 也是重要人物，雖然他們留在系內只有 1-2 年。在這十多年間，有 14 位訪問學者，他們來自外地，多停留 1-2 年，接力在中大作短暫教學。詳情可參看表 2。

表 2：1960 及 1970 年代入職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專任教師名單及背景

姓名	任教年分	最高學歷	教學經歷	其他
張丕介	1965-1967	德國弗萊堡大學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博士	中國中央政治大學	1965-1967 年兼系主任
魏大公	1965-1987	美國密蘇里大學博士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	1967-1970 年、1971-1974 年兼系主任
Charles C. Clayton	1965-1967	美國密蘇里大學學士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Mason Rossiter Smith	1967-1968	美國阿默斯特學院 (Amherst College) 學士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喻德基	1968-1969	美國埃奧華大學 (University of Iowa) 博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harles L. Allen	1969-1970	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	
陳閩	1970-1973	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		1970-1971 年兼系主任
John Hohenberg	1970-1971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		
沈承怡	1971-1972	美國密蘇里大學博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Slo W. Sanders	1972-1973	美國密蘇里大學學士		
李宜培	1973-1976	美國燕京大學 (Yenching University) 學士		
馬鴻昌	1973-1974	美國埃奧華大學博士	美國埃奧華大學	

表 2：1960 及 1970 年代入職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專任教師名單及背景（續）

姓名	任教年分	最高學歷	教學經歷	其他
Mark A. Reese	1973-1974	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碩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余也魯	1974-1982	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碩士	香港浸會書院	1974-1975 年、1977-1982 年兼系主任
陳黃義敏	1974-1976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博士		
John L. Mitchell	1974-1976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碩士		1975-1976 年兼系主任
黃維忠	1976-198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博士		1976-1977 年兼代系主任
張全聲	1977-1980	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		
皇甫河旺	1977-1987	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碩士		
Wilbur Schramm	1977-1978	美國埃奧華大學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	創辦碩士課程
朱立	1978-1991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		1987-1991 年兼系主任
李金銓	1978-1982	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		1994-1998 年任訪問教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余也魯曾於 1966-1968 年中大新聞系擔任兼職，其後在浸會書院開創傳理系並當上系主任。到了 1974 年，中大聘請他回到新聞系出任講座教授和系主任，至 1982 年退休。在他任內，新聞學系易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由兩年制變成四年制，加添了一些課程。當時黃維忠是唯一的香港人，在學系畢業後到美國學成回來，於 1976 年起任教了十多年。傳播學大師宣偉伯應其學生余也魯的邀請，於 1977 年到中大出任胡文虎傳播講座教授。他原本打算來 3 年，可惜只逗留了 1 年便返美（李少南，2015）。後來他和余也魯在 1982 年到大陸幾個城市作旋風式訪問，為傳播學日後在中國的發展埋下種子（蘇鑰機，2012）。

皇甫河旺、朱立、李金銓 3 位來自臺灣，在美國留學後到中大新聞學系任教。他們停留了頗長時間。皇甫河旺（2015）對領導中文編採課程很有貢獻，後來回去臺灣學界任職，多年後再到香港珠海學院出任新聞與傳播系系主任。朱立在 1970 年代末加盟，服務了十多年後移居澳洲，他在中大後期當系主任，穩定了系內的局面。後來朱立接受浸會大學邀請，擔任傳理學院院長直至光榮退休（簡

稱榮休)。李金銓在 1970 年代末在中大只逗留了 4 年，後來在 1990 年代中期再次來中大，他雖然沒有擔任主要行政職務，但在培訓學生和帶領研究團隊方面，影響甚大。李金銓自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榮休後，回港加入城市大學傳播與媒體學系，後期當系主任直至再榮休。他們幾位都和香港兩度結緣，而且貢獻良多。

這些老師的學歷，反映了一些外國大學對中大新聞系的影響。其實早年中大和其他香港學校的新聞系，都有很多外地學者，可說是「依賴式的發展」（俞旭、朱立、朵志群，1999）。從表 2 可見，中大早期有 6 位畢業於密蘇里大學的教師，來自埃奧華大學有 3 位，密西根大學有 2 位。他們都來自美國有新聞傳播學系的著名大學。這 22 位老師當中，有 11 位具博士學位。具碩士學位的有 6 位，只有學士學歷的 5 位，他們以教授新聞實務課程為主。兩類教師各有所長，負責不同範疇。早年的校外考試委員 3 年一任，由 1966 年開始，依次有國立政治大學的曾虛白、哥倫比亞大學的喻德基、南洋大學的陳光澤、波士頓大學的沈承怡、夏威夷東西中心的朱謙、國立政治大學的徐佳士。他們都是著名的華人傳播學者，來自不同地方的學校，願意為中大提供意見，協助塑造新聞系的課程。

由 1990 年代至今，本地研究型教師大多於美國著名新聞傳播院校獲得博士學位，往英國或歐洲攻讀的人很少，馬傑偉（2015）是一個異例。歐洲的學術訓練以文化研究和質性取向為主，是對美國主流量化研究的甚佳補充。此時也有少數在本地院校取得博士學位者加入教師行列，顯示香港的研究生教育日趨成熟。

表 3 列出歷任學系主任／院長的背景資料。在名單中，從任期先後和長短來看，較為關鍵的人物依次序是魏大公、余也魯、朱立、陳韜文、李少南、蘇鑰機、馮應謙、李立峯。在過去五十多年中，有三個短暫時期曾出現問題。第一個時期是由 1974–1977 年，主要是在 1976 年發生《沙田新聞》事件，令系內人事不穩。第二個是 1982–1986 年，當時香港政局不明朗，系主任變更頻繁。第三個是 1991–1994 年，六四事件後遺症令不少教職人員紛紛移民，要到數年後有人回歸和新血加入，才扭轉局面。

前期系主任的任期不長，多是約 1–3 年，後期較為規範，任期由 4–7 年不等。早期的系主任較多有海外背景，至 1990 年代中至今則明顯本地化，由香港人擔任院長。早期的系主任多畢業於密蘇里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後期則有幾位明尼蘇達大學的畢業生。由 1990 年代中期至今二十多年，5 任院長均為系友。陳韜文、李少南和蘇鑰機是早年哲學碩士班畢業，他們本科時分別讀農藝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如宣偉伯所言，有些學人在學術旅程中遇上傳播這個綠洲，稍息後便離開（Schramm, 1989）。三人卻繼續留下來，而且都在院內服務了超過 30 年，對學

表 3：歷任中大新聞與傳播系主任／院長名單及背景資料

姓名	任期(年)	地區背景	博(碩)士就讀學校	其他
張丕介	1965-1967	大陸	德國弗萊堡大學	經濟系系主任兼任
魏大公	1967-1970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陳閩	1970-1971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魏大公	1971-1974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余也魯	1974-1975	大陸	美國史丹福大學	
John L. Mitchell	1975-1976	美國	美國密西根大學	
黃維忠	1976-1977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本科系友
余也魯	1977-1982	大陸	美國史丹福大學	
朱謙	1982-1983	臺灣	美國史丹福大學	
鄭惠和	1983-1984	臺灣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關信基	1984-1986	香港	德國慕尼黑大學 (University of Munich)	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
朱立	1986-1991	臺灣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George A. Comstock	1991-1993	美國	美國史丹福大學	
梁偉賢	1993-1994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陳韜文	1994-1998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碩士系友
李少南	1998-2005	香港	美國密西根大學	碩士系友
蘇鑰機	2005-2011	香港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碩士系友
馮應謙	2011-2017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本科系友
李立峯	2017-	香港	美國史丹福大學	本科、碩士系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院的穩定發展甚有幫助。馮應謙和李立峯是新傳學院本科的系友，博士畢業後短暫在外校任教，接著回母校工作至今。

陸、教師和學生人數變化

學系的學生人數及其他教師資料，可參看表 4。過去五十多年，新傳學院的全職教師人數一直增加，學院不停擴展，不同傳播專業種類和學生人數都在上升。由 1965 年只有兩位全職教師開始，到了 1980 年代每年教師數目不夠十人，1990 年代人數開始上升，近十多年至今人數倍增。兼職教師自 1960 年代已有，但前二十多年每年不到十人。由 1990 年代開始，因大學的政策放寬，也由於新傳學院教學的需要，所以兼職教師人數大幅增加，到了 2000 年後因為修課碩士

表 4：不同年分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師生人數及教師背景

項目	1969	1979	1989	1999	2009	2019
全職教師人數	2	7	8	13	22	31
兼職教師人數	5	6	9	22	78	60
教師類別						
研究	2	6	7	12	17	20
純教學	0	1	1	1	5	11
教師背景						
香港	0	1	6	7	16	19
臺灣	1	5	2	0	2	3
大陸	0	1	0	3	1	5
外國	1	0	0	3	3	4
全職教師中系友人數及比例	0 (0.0%)	1 (14.3%)	3 (37.5%)	5 (38.5%)	10 (45.5%)	15 (48.4%)
男／女教師比例	2:0	7:0	6:2	12:1	13:9	15:16
行政及支援人員	1	4	7	14	24	37
本科生人數	38	95	164	236	254	474
修課碩士生人數	0	0	0	58	385	311
研究碩士生人數	0	6	17	27	13	12
博士生人數	0	0	0	4	26	3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課程的增加，令兼職教師人數達至高峰，近十年則有鞏固之勢，人數略為減少，但仍相當可觀。

學院一直以研究類型教師為主，新聞系創立時已表明是學與術並重。教授專業技能如編輯採訪等科目，則要依賴教學型的老師。這個趨勢在 2000 年代更為清楚，至今研究型 and 教學型老師的比例約為 2:1，反映了專業傳播教育課程的發展。

教師的背景反映了不同地區對學院師資的影響。早期的老師多來自臺灣，到了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本地化，1990 年代則引進了一些美國學者和有大陸背景的教師，臺灣和大陸教員此消彼長，教學團隊的成分變得較為多樣化。2000 年代後本地化的趨勢更明顯，主要是因為新增了一些本科和修課碩士課程。現時本地和外地教師的比例約是 6:4，這大概是個合適的比例。現時來自外國教師的國籍包括德國、荷蘭、韓國。教師的性別也值得注意。創系之後，多年來直到 1990 年代，女性教師人數極少，到了千禧年後才有明顯增加，至今男女比例差不多各半，這個變化符合時代的發展。

全職教師中的系友人數值得注意。中大新傳系友的人數比例一直都顯著，在

1980年代開始到1990年代，差不多近四成，到了千禧年後更超過四成，這個高比例和學院的發展有頗大關係，之後會再探討這個現象。

學院的行政支援人員的人數也有明顯增加，由早年的不到10人，到了1990年代有十數人，至今更高達三十多人。這是因為學院有很多不同的課程和活動，需要行政及技術方面的配合。行政同事人數反映學院課程性質及高活動能量，與其他學系比較更為明顯。現時學院有7位行政主任，其中5位是新傳學院的系友，另外兩位不是系友但也是中大畢業生。這個情況並非刻意安排，只是系友較願意回校服務，他們熟悉學院情況及工作投入，這和教師的高系友比例情況相似。

學生人數方面，1965年開始時只錄取了6名學生，他們在其他學系已修讀了兩年，到3年級才轉入新聞系。在1969年收了10人，1979年收生人數增至24人，1989年39人，1999年84人，2009年76人，2019年112人，此外還有少量修讀雙學位和雙主修的學生。以上只是本科生的人數，還未計碩士生和博士生，現時每年收取近三百名研究生。這五十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令人印象深刻。

到了1970年代新聞系的學制由兩年轉為四年，所以學生倍增。1980年代中大規模擴展，所以學生自然增加。到了1990年代，中大整體由四年制變為三年制，收生人數每年大增。到了2010年代，透過社會科學院「大類收生」途徑，轉入新傳學院第二年的學生人數眾多，所以令每年收生人數總和增至近一百二十人。新傳學院受到學生歡迎，收生成績要求高，是中大社會科學院各課程中收生成績最高的，在香港眾多新聞傳播院系中，公開試取錄成績也是名列前茅。

修課碩士課程始於1990年代，到了千禧年後課程數目和學生人數劇增，整體修課碩士學生人數和本科生相差不遠。後來大學調整政策，新的指標是研究生人數不應超過本科生人數的一半，於是新傳學院減收修課碩士學生。本科生的數目由大學規定，每年變化不大。修課碩士收生人數由學院自行決定，這個修課碩士與本科生的比例，令學院要縮減收生規模。研究型碩士課程收生人數一直不多，在1990年代末和千禧年初達至高峰，後來大學將研究生學額多撥給博士生，於是研究碩士生人數下降。

柒、教育理念和課程

中大新傳的學科發展在不同年代各有重點，創辦之初在1960年代以印刷新聞為主，1970年代加入廣播課程，1980年代加入廣告和公關科目，到了2010年代有新媒體和創意媒體，及加入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全球傳播強調國際化和海

外經驗，加強了新傳課程的立體感和多樣化。這種與時並進、由小到大、由窄到闊的走向，順應了時代的需求。中大一直強調通識教育，在大學層面和書院層面均有相關課程，強調要打好中、英文雙語基礎。

學系創立時已訂明學科以社會科學為基礎。中大開始就被設定為研究型大學，所以新聞系課程除了教授傳播技能，更要訓練學生的思考視野。學系初始的課程設計，受到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注重新聞實務訓練的影響。密蘇里大學對臺灣的新聞教育和事業，均有很大影響，它甚至對民國時期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和燕京大學的新聞系，都有相當貢獻（羅文輝，1989）。

比較香港幾所新聞傳播院校的課程，早年浸會學院的傳理系以專業技能訓練為主，後來加強社會科學基本訓練（杜耀明、丁偉，1992）。浸會大學近年銳意發展財經新聞，開展數據新聞作為新方向。它的電影學院一向提供獨特完備的影視課程。樹仁大學致力培養傳播行業人才，注重應用技術，有不同的實習平臺供學生參與（俞旭等人，1999）。珠海學院的新方向是重視跨媒體訓練，看重流動媒體。香港大學的新聞與傳媒中心成立以來一直發展國際新聞，以英文採訪寫作為重點。城市大學較為偏重廣播訓練，近年強調數碼科技及跨科際發展。恒生大學因其創辦機構的財經背景，其新聞系大力發展財經新聞報道（蘇鑰機，2017）。

中大的課程路向一貫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它的學術傾向比其他院校明顯。其理論科目在比例上較其他院校的為高（梁偉賢，1992），但與歐美主要院校相比大致相若。它一直以大學的要求來設計課程，以前收生人數不多，著眼培養中、高層的新聞管理人才。後來因社會和行業需要，才大力拓展學院規模和課程種類。中大的課程要兼顧專才和通才訓練，希望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讓學生在文字、影音、網上等不同平臺，都能掌握傳播工具，靈活運用表達技巧，讓畢業生在不同傳播行業發揮所長。學生要熟悉團隊合作，培養思辨能力，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畢業後可實踐社會關懷，秉持專業道德操守。這些能力和特質，除了應用在新聞傳播領域外，也可轉移到其他行業，不會浪費之前所學，要適應新時代環境的需求。

捌、學術取向和研究重點

瞭解一個學術研究單位的表現，可以用一些國際學術排名作為參考準則。夸夸雷利·西蒙茲（Quacquarelli Symonds, QS）在2011年推出全球大學學科的排

名，在傳播與媒體學方面，最早找到數據的年份是2013年。該年中大新傳學院在全球排名29，到了2017及2018年，排名升至20。2019及2020年的排名均為15，走勢持續上升。在2020年，中大新傳學院在亞洲排名第3，僅次於新加坡的兩間大學。同年香港其他三間公立大學傳播院系的世界排名，分別是25、38、51-100，均處於頗前位置。學術排名受很多因素影響，大家的看法和側重點未必相同，作為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或許對機構的表現有些參考作用。

中大新傳學院的研究路向，因應傳播職業分類，包括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創意媒體等。在理論領域方面，包括政治傳播、健康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國際傳播、文化傳播等，近年又開始發展網絡媒體、計算社會科學等。學院的教師按照各自的興趣，在不同範疇自選研究題目。陳韜文（1992，頁424）以前指出，早年香港傳播研究可分為四個主題：一、傳媒的使用及評價；二、政治傳播；三、傳播與社會變遷；四、資訊科技及其他。

近年比較清晰和有關香港的研究焦點有三個。第一個焦點和新聞有關，相關的研究包括香港記者調查、新聞機構公信力調查、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使用調查、路透社國際新聞比較調查、新聞記者角色表現國際調查等。一些出版的書籍有《變動中的香港記者》、《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獨家新聞解碼1/2》等。另一個焦點是政治傳播，曾進行的研究包括媒體在政治過渡期的角色、回歸採訪研究等。出版的書籍有《香港的報業和政治》、《七一解讀》、《數碼年代的媒體和抗議邏輯》等。第三個焦點是傳媒文化研究，曾出版的書籍包括《香港的創新和創意工業》、《全球遊戲工業和文化政策》、《香港的文化、政治和電視》等。

學院老師有若干著作和比較研究有關，除了之前提及的書籍，其他的例子包括《全球資本與本土文化》、《渴望香港、消費南中國：跨境文化》、《新電視、全球化與東亞文化想像》等。在2015年學院舉行比較研究國際會議，之後出版了專書《促進比較媒體與傳播研究》。

玖、學院的特色和傳承

中大新傳學院有一些明顯特色，首先是其東西學術匯聚的自我定位。C研中心在2012年成立，全名是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它強調三個C：中華（Chinese）、比較（comparative）、傳播（communication）。這三個關鍵詞概括了中心的特點，尤其是將比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取向。它的目標是致力傳播學

科發展，提倡大中華地區傳媒和比較傳播研究。它希望成為學術交流的樞紐，促進世界各地學者之間的對話。其活動包括舉辦國際會議、研討會和講座、追蹤性研究、出版等。學院於 2004 年設立了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為學術界和其他社會機構進行跨學科的社會及傳媒研究。近年曾進行的大型研究包括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傳媒體公信力調查、公眾對媒體和民意的意見、香港民意和政治發展等。學院每隔數年便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希望聯繫東西學術界，探討一些重要傳播議題。近年曾舉辦的題目包括比較傳播研究、中國傳播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數碼方法和社會發展研究高峰會等。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聯繫社會方面發揮一定作用，它除了協助進行學術研究外，也對社會重要傳播議題發聲，讓市民大眾對事情有更多瞭解。

第二是課程設計注重彈性。課程設計提供一個框架，學生可以有足夠科目選擇。在不同年代設立了四個不同的專業範疇，包括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和創意媒體。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比例的理论課程或實務科目。在修課碩士課程當中，也有五個不同範疇的設置，另有研究型的碩士及博士課程。它們有不同行業焦點，理論和實踐的配搭比例不同。近年設立的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拓展了課程的多樣性，配合了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例如數碼化和科技化是當今主流，於是在課程上增加相應科目，包括「社交媒體分析技術」、「社交媒體與危機溝通」、「新媒體廣告」、「新媒體工業」、「數碼新聞學」等。

第三是教研人員以本地化為主。學院課程要面向社會，照顧不同傳播行業需要，所以要相當程度的本地化，關鍵在哪個程度才算合適。教師以本地人為主體，同時有外籍學者配搭，還有全職教師和兼任老師互相配合，希望達到較理想的平衡。中大早在 1990 年代聘請不少資深傳播界專才兼職任教。在研究方面也有若干程度的本地化，大家撰寫中英文學術文章和書籍，也有在報刊發表時事評論。研究者運用西方理論，結合本土事例、又參與大陸、香港、臺灣的學術連線，例如在 2004 年時出版了《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是最早的三地記者調查研究。

第四是員工的系友比例高，可稱之為「系友化」或「院友化」現象。中大新傳學院歷史悠久，能吸引優秀學生和人才，畢業生到外地深造再回到母校服務，正如一窩蜜蜂各自出外採百花蜜，回來後共同貢獻所得。這不同於在同一機構畢業後，隨即留校任教，未曾經歷往外走的洗禮，出現學術「近親繁殖」（王彥，2017，頁 103）。中大一方面本地化，但某程度也要國際化，並且吸納大陸和臺灣的人才。本地化是要「積極培養本地的傳播研究者，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最後

吸引他們回流」(陳韜文, 1992, 頁 435)。這些系友有相同的中大背景, 也有外地不同院校學習經歷, 可說是有同有異。回校服務後, 大家熟悉環境, 對學院有向心力和認同感, 辦事更加投入, 同事之間有師生或同學關係, 有利於團隊工作, 正如李金銓(2015, 頁 87)所說:「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 有序的, 也是源遠流長了。」

教員本地化和系友化是可取的做法, 但實行起來不容易, 要有很多因素配合。本地化首先涉及學校的類型, 私立大學以教學為主, 研究要求較次, 找資深業界人士當老師不難, 所以私立大學的教師容易做到本地化。公立大學重視研究產出, 特別是研究型的大學, 因此更需要聘請研究型教師, 他們要有足夠學術資歷訓練, 在本地較難找到合適人才。本地老師中有博士資歷的不多, 有海外著名大學學位和經歷的更少。外籍老師一般來自海外著名大學, 研究能力較強, 聘請他們可令教師團隊多元化, 但他們大多只能教授理論科目, 行政和社會服務的貢獻較少。因此公立大學教師的本地化不容易做到。中大新傳學院是個例外, 在2019年它的31名全職教師中, 20位是本地人, 比例占65%。全職教師有20位屬研究類的, 當中有10個是本地人, 剛占了一半。其他香港公營大學的本地化程度更低, 研究類老師中本地比例甚至不到一成。為何中大較能做到本地化, 這涉及系友化的因素。

要做到系友化, 前提是學系的學生素質要好, 有畢業生選擇繼續進修, 他們到海外讀博士, 志願是教學和做研究, 之後自然想回母校服務, 促成了學院的系友化。一般新傳院系的學生多打算畢業後進入相關行業工作, 深造的意欲很低, 以培養傳播專業人才為主的院校更是如此, 這不利於出現系友化現象。近年不少內地生到香港讀本科或研究生課程, 他們較願意走學術之路, 畢業後可能回到香港的母校服務, 可說是實現了「半本地化」, 但非純正的本地化。所以說本地化和系友化只能是個目標, 不是所有院校都有條件做到。中大新傳學院因為一向重視研究培養, 師生傳承有頗多例子, 有畢業生願意出外深造並回校服務, 於是某程度上成就了系友化和本地化。再以中大新傳學院作統計, 2019年在所有教師中, 系友的比例是48%, 在研究類教師中的系友比例是45%, 相對其他院校的情況也是偏高的。往後如果學系的發展要朝這個方向走, 可做的是多鼓勵本地學生選擇學術之路。本地化和系友化可能是一個學系發展的罕有模式, 有院校引入大量學術外援, 以「非本地化」作為藍本, 也有系所採用混合模式, 以配合自己的實際情況。

在管理方格理論中有五種風格, 最差的是「漠不關心」風格, 令員工不開

心而且工作沒有成效。只關心員工心情的「鄉村俱樂部」風格，和只看工作成果的「獨裁」風格均不理想。還有「中庸之道」風格以兼顧員工及工作，盡量取得平衡。最佳的是「團隊」風格，它既能照顧員工福祉又達成生產效能（Blake & Mouton, 1985）。如果一間機構的領導能夠多為集體設想，員工之間有相近背景和共識，有利於建立良好的氣氛和高效的工作環境，達致團隊模式。系友比例高，容易在工作上建立團隊精神，大家合作順利，促進良性競爭，學院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達到多贏結果。

中大新傳學院見證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整個歷程，包括了不同輩分的學者，他們之間有老師和學生的傳承關係，也有不同的歷史分期。可以說，第一代的傳播學者是喻德基、朱謙、余也魯、魏大公，第二代以朱立和李金銓為代表，第三代包括陳韜文、李少南、蘇鑰機，第四代是馮應謙、李立峯等。他們曾在不同時間服務於中大新傳學院、特別是第二至四代人員之間的關係密切，第二代是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老師，第三代又是第四代的老師。這種自然而有序的傳承過程，對促進學院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學院正期待本地第五代更年輕一輩的出現和茁壯成長，將來可接班傳承下去。

拾、總結和前瞻

學院和社會之間有一定關係，但關係未必直接，視乎不同時期和情況而定。回顧一個機構的發展，還要考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從宏觀角度，中大新傳學院不單和香港社會的發展有聯繫，它和大陸及臺灣的傳播學界的互動也值得探討。結構和個人能動的關係是辯證的，結構因素很多時占了主導，但個體也可在某時刻發揮關鍵作用，足以扭轉歷史進程，或者和結構有頗多互動（Archer, 2003）。之前提及早年的魏大公和余也魯前來中大，負責開創學系，發揮很大作用。後來朱立和李金銓受聘來到香港，對學系的發展有重要貢獻。1980年代本地的陳韜文、李少南和蘇鑰機從別的學術領域轉投新聞與傳播學，後來多年負責院務，對學院的進程有深遠影響。近年接力的馮應謙和李立峯，都在不同時期發光發熱。他們在某個關鍵時刻來到中大新傳學院，可說是歷史的偶然，卻見證了個人能動對機構的影響。

文首曾經提問，中大新傳學院的一些做法和經驗，是否可複製到其他機構，作為參考之用。對社會的關懷和參與積極參與，是學院的一項傳統特色。如何認清自己的定位並善用優勢，也是另一種經驗。在本地化和多元化之間如何取得適

當的平衡，怎樣進行傳承工程以作長遠規劃，也是重要議題。中大的本地化和高系友比例，需要有一些配合的因素才能達成，其他學系可能不一定能夠做到。其他學術機構同樣面對以上的考量，或許某程度上可借鑒分析中大新傳學院走過的路。

展望未來，大家都很關心傳媒行業面臨的困境，如何應付新傳播科技帶來的挑戰，業界和院校要如何轉型。在回應新科技環境帶來的機遇和要求，中大在課程上已經有一些新做法（蘇鑰機，2017）。第一是多著眼數碼多媒體訓練，提供更多相關科目，加強學生的能力，以追上時代和媒體工作的要求。第二是整合一些課程的板塊。例如將實習刊物的內容在網上發布，除了文字圖片外，又增加了錄影拍攝，放在 YouTube 供人觀看。這幾年也發展社交媒體，在 Facebook 發放消息，又在網站上做即時新聞報道。不同的實習課程之間在技術或研究對象可能有重疊，透過課程結構重整，學生可一起修讀相同科目，共同探討不同行業的傳播議題。

第三是發展微型課程，以補充傳統科目的不足。這些微型課程有很大彈性，時間可長可短，形式如短期的工作坊，只占一個學分，有不同組合，以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內容涉及各種電腦軟件和工作技巧等。第四是引進新的合作夥伴。在校內透過和其他院系推出雙學位、雙主修課程，讓同學修讀相關學科如工商管理和電腦資訊工程等。在校外可和海外大學有學生交換計畫、老師短期互訪甚至課程合作。第五是和傳播業界加強合作，多聘資深從業員作兼職老師，將業界的最新經驗和知識帶給學生。學生又可利用暑假實習機會及短期的參觀訓練課程，或參加大專界及公開的比賽。

過去五十多年，中大新傳學院整體發展尚算順利，除了在 1970 年代有內部的偶發事件，和在 1980 及 1990 年代受到社會情況影響，曾出現短暫的不穩定時期。踏入下一個十年，因應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要面對一些挑戰。首先是教研人員的流失，例如在 2020 年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助理教授選擇離開，分別到新加坡和美國任教，這種情況以前較為少現。未來是否繼續有人員流失，如何留住人才，保存團隊精神和協作文化，是個迫切問題。其次是在新的政治和法規環境下，教學和研究的自主空間能否保持。這不單涉及現時的教研人員，也可能影響未來的教師和學生加入的意願。第三是學術人員接班問題，系友會否願意回歸母校，能夠接棒延續院務發展。

當然有危也可能有機，中大新傳學院畢竟有深厚傳統，崇尚優質教研和社會參與，以往的經歷是個良好範例。它在國際學術界排名頗高，在華人傳播學界和

香港業界享有聲譽，特別在比較研究、學術交流、本地化和團隊合作等方面都有特色。學院如何回應教育、學術和社會的需求，如何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成熟期之後是新機遇還是走下坡，這些都是要面對和解決的議題。

參考書目

- 王彥（2017）。〈香港新聞傳播學界的成名與想像（1927–2006）——專訪臺灣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朱立〉，《國際新聞界》，5：85-108。
- 朱立（2015）。〈吐露傳情十六年〉，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78-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朱雯、黃郁文、李玉蓮（2015）。〈校友茶聚話當年〉，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61-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余也魯（2015a）。〈發展中大新聞系〉，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72-7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_____（2015b）。《萬水千山都是詩：余也魯回憶錄》。香港：海天書樓。
- 李少南（2015）。〈課堂二三事〉，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9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李玉蓮、姚霞主編（2005）。《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四十週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李金銓（2015）。〈兩段中大的香港因緣〉，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85-8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李家園（1989）。《香港報業雜談》。香港：三聯書店。
- 杜耀明、丁偉（1992）。〈新聞教育與社會政治發展：浸會學院傳理系新聞專業課程個案分析〉，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65-48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 俞旭、朱立、朵志群（1999）。〈香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研究〉，俞旭、

- 郭忠實、黃煜(編),《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頁319-347。香港:中華書局。
- 皇甫河旺(2015)。〈懷念中大那八年〉,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82-8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香港中文大學(1969)。《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香港:作者。
- _____(1975)。《漸具規模的中文大學:1970-1974:大學校長報告書》。香港:作者。
- _____(1979)。《新紀元的開始:1975-1978:大學校長報告書》。香港:作者。
-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5)。《新亞書院概況》。香港:作者。
- _____(1969)。《新亞書院二十週年校慶特刊》。香港:作者。
- 馬傑偉(2015)。〈寫下新傳名句〉,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9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梁偉賢(1992)。〈香港大專院校新聞與傳播教育之比較研究〉,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頁481-49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 陳韜文(1992)。〈香港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17-44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 陳韜文、程曉萱(2017)。《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訪問學者計畫十週年特刊2008-201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陳韜文、蘇鑰機(1996)。〈以範例問題帶動的新聞實務教育——從《大學線》月刊說起〉。《臺大新聞論壇》,4:224-250。
- 黃建業(2015)。〈回憶六十、七十年代的新聞系和新亞書院〉,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22-2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馮德雄(2015a)。〈沙田新聞事件〉,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26-2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_____(2015b)。〈悼魏大公博士〉,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70-7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黎淑怡 (2015)。〈八十年代的新傳系〉，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 (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28-3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魏大公 (1967)。〈中文新聞從業員的培養〉，《新亞生活雙周刊》，9 (13)：1-3。
- 羅文輝 (1989)。〈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1：201-210。
- 蘇鑰機 (2012)。〈傳播學的中國播種人——余也魯 (1920-2012)〉，《財新新世紀周刊》，39：114。
- _____ (2015)。〈資深校友率先為學院慶祝生日〉，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 (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66-6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_____ (2015 年 10 月 31 日)。〈細說中大新傳 50 年〉。《明報》，第 D4 版。
- _____ (2017 年 12 月)。〈新科技環境下新聞教育的新路向〉，論文發表於「第十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新聞研討會」，中國，澳門。
- _____ (2020 年 3 月)。〈中大新聞系早年教師點將錄〉，《校友通訊》，3。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alumni.com.cuhk.edu.hk/e-news/2020v1clementso/>
- 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 (編) (2015)。《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Archer, M. S. (2003). *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ake, R. R., & Mouton, J. S. (1985). *The managerial grid III: The key to leadership excellence*. Houston, TX: Gulf.
- Dutta, M. J. (2011). *Communicating social change: Structure, culture, and agenc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hramm, W. (1989).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behavioral science: Jack Hilgard and his committee. In S. S. King (Ed.),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Selected contemporary views* (pp. 13-26).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ztompka, P. (Ed.). (1994). *Agency and structure: Reorienting social theory*. Yverdon, Switzerland: Gordon and Breach.

Organizational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 Clement York-Ke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bstract

An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depends primarily on its internal planning and operation, as well as partly on its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some individuals as agency can exert vital influences.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a case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change.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six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School in tandem with the major social events in these stages in order to ascertain linkages between the School's history and the larger social context. We shall also explore the School's educational ideals, curriculum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research foci. Some experiences will be summarized from the School'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especially about teaching staff localiz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alumnization." There is also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School's curriculum responds to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new political climate of Hong Kong.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history, social change, individual agency, localization, alumnization

*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